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內部的知識論差異與方法論多元

The Epistem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Methodological Plurals in Constructivism

doi:10.30390/ISC.200909_48(3).0003

問題與研究, 48(3), 2009

Issues & Studies, 48(3), 2009

作者/Author : 莫大華(Ta-Hua Mo)

頁數/Page : 63-9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09/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909_48\(3\).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909_48(3).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內部的 知識論差異與方法論多元*

莫大華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系副教授)

摘要

國際關係建構主義學者內部不同知識論的爭論或焦慮，尤其是現代建構主義與後現代建構主義的知識論爭議，因為後者根本反對有共同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存在，影響了建構主義內部的建橋計畫，乃至整個國際關係理論建橋計畫的可能性，更明確地說，國際關係理論的綜合是否可能呢？遂有必要更為細緻與詳細的探討不同建構主義學者個別的觀點，藉以呈現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複雜性、多元性。本文以 Alexander Wendt、Jeffrey Checkel、Emanuel Adler 和 David Campbell 等建構主義學者作為範例探討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與方法論爭議，Wendt 與 Checkel 是科學實存論的現代建構主義，Adler 是務實實存論的現代建構主義，Campbell 是反實存論後現代建構主義，四人在知識論與方法論上的主張，正可以呈現出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爭論，並簡介建構主義常用的研究方法，以說明建構主義的多元方法論，作為觀察國際關係理論綜合的基準與評論基礎。

關鍵詞：知識論、方法論、建構主義、科學實存論、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

* * *

壹、前言

自從 1990 年代開始，建構主義爭論了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本體論假定，使建構主義成為國際關係理論辯論的核心理論，但是隨著建構主義學者的著作出版漸多之

* 本文發表於 2008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2008 年 9 月 27、28 日，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國際會議廳；並曾獲得國科會專案研究補助（計畫編號：NSC 96-2410-H-606-001）。

後，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也漸漸關注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差異，^①甚至呼籲不僅是要建立國際關係理論各理論學派之間的「建立（溝通）橋樑計畫」（bridge-building project），尋求理論之間的對話與溝通，而致力尋求理論綜合；^②建構主義內部也應該從事「建橋計畫」，因為建構主義內部對於知識論存有爭論，乃至對於建構主義本身的「本體論」（亦即建構主義的定義）也出現爭論。^③因此，遂有國際關係理論學者企圖擺脫這些後設理論的（metatheoretical）爭論而提出方法論（methodology）^④的多元論（pluralism）主張，嘗試從經驗研究的角度，提出研究策略而強化建構主義的實務運用效能。^⑤

本文以 Alexander Wendt、Jeffrey Checkel、Emanuel Adler 和 David Campbell 等建構主義學者作為範例探討建構主義內部對於知識論與方法論的爭議，Wendt 與 Checkel 是科學實存論的現代建構主義，Adler 是務實實存論的現代建構主義，Campbell 是反實存論後現代建構主義，四人在知識論與方法論上的主張，正可以呈現出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爭論；本文並簡介建構主義常用的研究方法，以說明建構主義的多元方法論，作為觀察國際關係理論綜合的基準與評論基礎。

貳、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焦慮^⑥

建構主義理論內部的知識論分歧與建立橋樑的計畫，無論是其實證主義或後實證主義的知識論主張，其所要爭論的是本體論能否與知識論區隔？實證主義的物質（客觀）本體論與經驗（解釋）知識論，以及後實證主義的理念（主觀）本體論與反思

註① 較為特殊的是關注建構主義內部的本體論差異，參閱 Vincent Pouliot, “‘Subjectivism’: Toward a Constructivist Methodolog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2 (2007), pp. 359-384;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Foregrounding Ontology: Dualism, Monism, and IR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4, No. 1 (2008), pp. 129-153.

註② 參閱莫大華，「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畫－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綜合」，*政治科學論叢*，第 31 期（2007 年 3 月），頁 175-216。

註③ 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內部的建橋計畫－知識論的對話與綜合」，*復興崗學報*，第 87 期（2006 年 9 月），頁 221-250。

註④ 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中，方法論（methodology）一詞，常是包含了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與方法論（methodology）兩者的意涵，前者是指蒐集與分析資料的技術與程序，其本身是中立的；後者則是討論研究方法的哲學基礎，對研究方法進行後設理論研究，尤其是經驗研究的方向。讀者必須從學者著作的內容理解其所指稱的方法論是何種意涵，本文則是以前者為主要的內容。

註⑤ 例如 Audie Klotz and Cecelia Lynch,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in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M. E. Sharpe, 2007)。

註⑥ 如上所述，這是因為建構主義理論是沒有共同的知識論基礎，而使得建構主義學者成為陌生夥伴，所謂知識論焦慮是為陌生夥伴而來。當理論學派內部對於知識論沒有共同基礎時，相同學派的學者之間就成了陌生的夥伴，因此，有些學者就引用著名的「笛卡兒焦慮」隱喻這樣的狀況，例如 Wendt 指涉經驗論者與後現代主義者對建構主義的知識論焦慮。本文也以此隱喻建構主義內部知識論的差異。

(理解) 知識論, 能否相互結合成為實證主義物質本體論與後實證主義反思知識論, 以及後實證主義理念本體論與實證主義經驗知識論? 也就是本體論與知識論能否相互交錯而能融合在一起成為綜合的後設理論立場? 例如 Wendt 所主張的在知識論上的實證主義, 在本體論上的後實證主義。^⑦其次, 主張中間道路 (via media)^⑧的現代 (傳統) 建構主義是在重新建構而非挑戰理性主義, 詮釋 (interpretive) 建構主義與激進 (radical) 建構主義是在解構、挑戰理性主義, 乃至中間地面 (middle ground) 的建構主義, 如何在不同知識論的建構主義之間也能建立溝通橋樑, 正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主題之一。或許這也呈現出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焦慮 (epistemological anxiety), 因為建構主義理論是沒有共同的知識論基礎,^⑨而使得建構主義學者成為陌生夥伴 (strange bedfellows), 所謂「知識論焦慮是為陌生夥伴而來 (Epistemological anxiety makes for strange bedfellows.)」。^⑩為探究此知識論焦慮, 實有必要藉由個別建構主義學者的知識論主張, 釐清此知識論焦慮對於建構主義內部的衝擊與影響, 以下選擇 Wendt、Checkel、Adler 與 Campbell 的知識論與方法論觀點作為例證, 說明建構主義內部對此知識論焦慮的認知與體認。

Wendt 與 Checkel 是科學實存論的現代建構主義, Adler 是務實實存論的現代建構主義, Campbell 是反實存論後現代建構主義,^⑪這四位學者在建構主義的理論發展過程中, 都扮演著重要角色, Wendt 是促使建構主義成為當代國際關係重要理論的關鍵

註⑦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90.

註⑧ 國內普遍將 *via media* 翻譯為「中庸之道」, 這是筆者在寫第一篇有關 Wendt 建構主義時的「天外飛來一筆」靈感而來, 但隨著研究越深入之後, 反而覺得不妥。因為「中庸之道」一詞帶有價值判斷之意, 「中庸之道」在中文詞意中是正面的, 是孔子讚美君子言行始終奉行中庸之道, 所謂「不偏不倚謂之中」, 無不過與不及。然而 Wendt 提倡在實證主義知識論與後實證主義 (詮釋) 主義本體論之間, 或是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建立 *via media* (出自 Steve Smith 給 Wendt 的建議) 的建構主義學者, 原有的意思是藉此建立不同國關理論之間對話溝通的橋樑。後來 Wendt 也用 *middle way* 表示其意, 即是作為連結不同理論的中間道路, 因此, 翻譯成中間道路 (middle way) 是比較合乎原意。另外, Adler 則用 *middle ground* (中間地帶) 表示, 即是這些建構主義學者嘗試要在兩極對立的理論學派之間建立對話, 國際關係學界稱之為「建橋計畫」(bridge-building projects)。就原文而言, *via* 有經由 (by way of) 的意思, *media* 則是有中間 (middle) 的意思, 似乎翻譯成中間道路較為合宜。

註⑨ 有關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差異, 而產生的不同知識論對話與綜合, 參閱莫大華, 「國際關係建構主義內部的建橋計畫—知識論的對話與綜合」, *復興崗學報*, 第 87 期 (2006 年 9 月), 頁 221~250。

註⑩ Wendt 原是指涉經驗論者與後現代主義者對建構主義的知識論焦慮。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49.

註⑪ 不同學者對於建構主義有著不同的分類標準, 本文依據四位學者的知識論差異區分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兩類, 進而從其科學哲學觀差異區分科學實存論、務實實存論與反實存論, 有關建構主義理論的內涵、分類與比較, 參閱莫大華, 「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 *問題與研究*, 第 38 卷第 9 期 (1999 年 9 月), 頁 93~109; 莫大華, 「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原型、分類與爭論—以 Onuf、Kratochwil 和 Wendt 的觀點為分析」, *問題與研究*, 第 41 卷第 5 期 (2002 年 5 月), 頁 111~148。

學者，甚至目前的國際關係理論辯論是圍繞著 Wendt 所建立的科學實存論建構主義，也就成為主流的建構主義學者；Checkel 則是致力於探索建構主義的因果機制，他以國際社會化（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與過程追蹤（process tracing）研究歐盟，提升建構主義的經驗研究水準；Adler 是建構主義的先驅學者，他提出認知演化（cognitive evolution）理論與「知識社群」（epistemic community）增強建構主義的經驗研究；Campbell 則是從後結構論觀點重視語言、文化、歷史與科際整合，而使建構主義更加多元與豐富，並以論述分析呈現或再呈現建構主義所主張的詮釋邏輯。從這四位建構主義學者不同的知識論與方法論主張，即可發現建構主義是較為複雜的國際關係理論。

一、Wendt 的科學實存論

Wendt 強調本體論優先於知識論，他意圖把不相容的本體論與知識論結合起來，藉由發展建構主義而在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建立溝通橋樑，並以科學實存論作為建構主義的哲學基礎，引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新論辯。科學實存論是一種科學哲學，其假定世界（即客觀世界）獨立存在於人類之外，成熟的科學理論指涉此客觀世界，即使科學對象是不可觀察的，亦復如此。理論反映真實，而不是真實反映理論，本體論先於知識論。科學是一個知識論上享有特權的論述，藉由科學我們可以獲得對這世界有日益增加地較為真實的理解。Wendt 的建構主義是在主觀的理念主義本體論上，強調科學多元化的實證主義知識論，並且理解式的知識論也是有其重要角色。他一方面以限定建構主義是本體論而非知識論的方式來封住（block）後實證論者的批評，另一方面運用科學實存論來封住經驗論者以可觀察的作為本體論之主張。他認為因果問題與構成（constitutive）問題都有助理解國際政治內的理念與社會結構。¹²也就是說，在知識論上，他認為實存論與經驗論之間的爭論在於不可觀察實體（unobservables）的本體論狀態，但不可觀察實體與其因果機制（casual mechanisms）可藉由科學理論而存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沒有不同，科學解釋也可運用在社會科學。¹³簡言之，他認為社會實體客觀獨立於思想與個別觀察者的語言之外，但仍可運用科學理論予以解釋，即使是不能直接觀察。科學有助於我們理論性的理解與外在世界的深層結構相一致。¹⁴就實存論者而言，解釋與理解之間並沒有知識論的差異，而是在其理論化過程中有顯著的分析或方法論差異。因果解釋的理論化是鼓勵務實的研究途

註¹²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8-47.

註¹³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3-394; James Fearon and Alexander Wendt, "Rationalism vs. Constructivism: A Skeptical View,"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 210;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 39, 77, 374, 378.

註¹⁴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51-76.

徑，其方法論基準是只要能幫助我們理解世界運作方式的方法都可以；構成理解的理論化則是不適用獨立變數與依賴變數的因果推論，而是要以經驗證據（empirical evidence）來判斷。^⑮其實，這是因為 Wendt 認為社會科學家不用擔心知識論問題，關鍵在於解釋世界而不是爭論認識世界的方法，在這喧囂的科學辯論中，知識論一般會自行處理認識世界的方法。^⑯

因此，Wendt 根據其科學實存論的主張提出其方法論觀點，首先，他引用哲學的「根據最佳解釋推理」（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觀點說明這是科學方法的核心，是我們獲得知識的最確定途徑，而且也繼續會是這樣。^⑰因為實存主義並不限定任何特定的本體論、任何特定的方法或任何特定的社會理論，就此而言，也並未限定任何特定的世界政治理論。^⑱這或許說明了 Wendt 何以大膽地引用量子意識理論（quantum consciousness hypothesis）說明，理念也是可以進行科學研究，為其所引發的批評與討論提出辯護，並以波與粒子雙元性關係（wave-particle duality）、波函數崩陷（wave function collapse）、測量問題（the measurement problem），以及非局部性（non-locality）說明社會科學探索的身心（mind-body）問題，即是社會科學的本體論與知識論觀點，而成為一個量子社會科學（或社會物理學），以此主張其科學實存論的觀點。^⑲根據 Wendt 自己的說法，他是要以量子理論提供綜合各理論的一把傘；而且認為他的方法論始終是折衷的，研究總是問題導向（question-driven）而不是方法導向（method-driven），因此，建構主義使用質化形式理論方法或量化方法都可以。^⑳簡言之，Wendt 的方法論是開放多元的，或者更明確地說這並不是他所關切的，只要本體論的問題處理好了，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問題也就處理好了。

二、Checkel 的科學實存論

Checkel 自稱是現代論建構主義者，喜好鬆散的因果知識論，但挑剔方法論的個體主義。^㉑不同於 Wendt 本體論先於知識論的主張，Checkel 則是更為關切知識論的議題，尤其是建構主義內部應關切此議題，因為傳統建構主義學者（包括 Wendt）認為

註⑮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79-88.

註⑯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373.

註⑰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62-63.

註⑱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91.

註⑲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 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ndt and his Critics*, pp. 189-205.

註⑳ P. Schouten, "Theory Talk #3: Alexander Wendt on UFO's, Black Swans and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ory Talk*, <<http://www.theory-talks.org/2008/04/theory-talk-3.html>> (25-04-2008) (Accessed at August 8, 2008); Alexander Wendt and Raymond Duvall, "Sovereignty and the UFO," *Political Theory*, Vol. 36, No. 4 (August 2008), pp. 607-633.

註㉑ Jeffrey T. Checkel, "Why Comply? 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3 (2001), p. 554.

大家都是實證主義者為什麼要討論知識論，以及受到 Wendt 主張本體論先於知識論的影響，而造成其缺乏關注知識論問題而嚴重限制其建橋計畫。就知識論而言，他認為無論是何種類型的建構主義都能從其他相對類型的建構主義獲得協助，傳統建構主義運用詮釋建構主義的論述研究法，詮釋建構主義則是運用了傳統建構主義的過程追蹤法，皆可以科學實存論、分析折衷主義、實用主義與傳統主義達成混合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方法的目的。而且，隨著建構主義學者逐漸關注研究方法，建構主義之間的方法論爭論未來將超越知識論爭論。^⑳

他嘗試以「過程追蹤」的研究方法與科學實存論作為建構主義內部知識論基礎，科學實存論可以作為過程追蹤法的概念基礎，以及統一建構主義之間知識論差異的廣大平台，並且提供一個哲學與知識論的中間道路充實美式實證主義與歐式後結構主義之間廣大的方法論空間。^㉑例如「社會化」(引導行為者納入特定社會的規範及規則之中的過程)^㉒、國際規範的「賦權」(empowerment)過程。^㉓簡言之，他認為由於建構主義學界並沒有知識論與方法的共通標準，應在建構主義內部建起溝通橋樑，以概念多元主義及後設理論多元主義鼓勵對話與相互學習，則建構主義就能一致了。^㉔

三、Adler 的務實實存論

Adler 認為建構主義是嘗試在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與詮釋主義之間建立溝通橋樑，它是理性主義與相對(詮釋)主義之間真正的中間地面，因為在本體論上它立基於物質主義與理念主義、個別的行為主體與社會結構的雙交會口，以在知識論上相互主觀(詮釋)的意涵，它在科學哲學上是實用主義。他以集體理解的認知演化理論詮釋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認知演化是指社會世界建立社會事實的方式，與社會事實運用影響力的方式有關，因此，歷史過程中的任何一個時空，社會事實是由物質世界與社會世界的集體理解所社會建構的。認知演化理論是一個國際學習的理論，能使建構主義以經驗研究為取向，他希望建構主義能重新發現如何將理性考量帶入集體的人類事

註^㉑ Jeffrey T. Checke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ARENA Working Paper*, WP06/06, 2006.

註^㉒ Jeffrey T. Checkel, "It's the Process Stupid! Process Tracing in the Study of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RENA Working Paper*, WP05/26, 2005.

註^㉓ 此項研究是 2005 年秋季號的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專輯，參閱 Jeffrey T. Checke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Fall 2005), pp. 801~826; Michael Zurn and Jeffrey T. Checkel, "Getting Socialized to Build Bridges: Constructivism and Rationalism, Europe and the Nation-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Fall 2005), pp. 1045~1079.

註^㉔ Jeffrey T. Checkel,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Politics: Bridging the Rationalist- Constructivist Divid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4 (1997), pp. 473~495.

註^㉕ 原文是指歐洲建構主義學者教導其學科同行一些新技巧，假以十年後，則溝通橋樑的努力就能反敗為勝。而且，如果建構主義學者前的形容詞「歐盟」消失，則就會是成功的最後訊號。Jeffrey T. Checke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ARENA Working Paper*, WP06/06, 2006.

務上。^⑺

對於建構主義內部分歧的問題，Adler 認為務實的實存論提供了鞏固建構主義內部共同基礎的一個方法，建構主義內應該建立一致的方法論基礎，並減緩其知識論與本體論的爭論而集中於建立實質理論，加強發展其細部的基礎（micro-foundations），例如理解個體與社會結構之間關係及過程的社會機制（social mechanism），以及重視建構主義的實踐結果與政治結果，強調科際整合研究（例如國際法、社會心理學、認知心理學、複雜理論）。^⑻ Adler 認為方法論是建構主義理論與研究中主要的遺失環節（missing link），發展一致的方法論基礎決定了建構主義對國際關係研究的深刻影響，此一致的方法論基礎是要發展務實的替代方案，而非模仿自然科學。此一致的方法論即是演進的途徑（evolutionary approach），包括所謂「過去經驗教訓」（lessons of the past）的敘述，以及「建立想定」（building scenarios），其基礎主要是社會事實的歷史重建為中心，以詮釋敘述、實務與論述為基礎，不在預測而在解釋過去與現在的事件、實務與利益如何成為可能，以及為什麼發生在其發生的時空。^⑼簡言之，就是從本質（being）到形成（becoming）的認知演進（cognitive evolution）過程，而能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與 Wendt 的方法論整體主義（methodological holism）。^⑽

在知識論上，Wendt、Checkel 與 Adler 都選擇實存論作為科學哲學立場，Wendt 與 Checkel 是採取科學實存論，但由於 Wendt 強調本體論先於知識論，遂不在意知識論議題，知識論自己會處理，連帶著方法論議題也就沒有問題；Checkel 則是重視知識論的議題而提出過程追蹤的研究方法。Adler 則是採取務實的實存論，強調科際整合的研究方法，以建立一致的方法論基礎，並減緩其知識論與本體論的爭論而集中於建立實質理論。

四、Campbell 的反實存論

不同於上述三位的實存論立場，Campbell 反對國際關係理論內含的知識實存論，而是主張必須藉由相互主體的論述才能知道客觀世界的存在，但他也反對 Wendt 從科學實存論發展而來的建構主義。^⑾ Campbell 為說明其本身的後結構論觀點，是不同於

註⑺ Emanuel Adler, "Seizing the Middle Ground: 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3 (1997), pp. 319-363.

註⑻ Emanuel Adler,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 28, pp. 109-111.

註⑼ *Ibid.*, p. 109.

註⑽ Emanuel Adler, *Communitar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pistemic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31-88.

註⑾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pp. 219-222; David Campbell, *National Deconstruction: Violence, Identity, and Justice in Bos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pp. 24-25.

建構主義而從建構主義內部區分出具批判傾向的 (critically inclined) 建構主義學者，他稱為批判建構主義者、社會建構主義者或批判社會建構主義者，如 Barry Buzan、Ole Waever、Jutta Weldes、Mark Laffey 及 Wendt。他為釐清普遍以建構主義包含後結構主義與批判的建構主義之趨勢，遂特別強調後結構主義與批判建構主義的差異。他認為後結構主義重視認同體的運作構成 (performative constitute) 而不僅是相互構成；在本體論上關注理念主義與物質主義的運作性 (performativity) 而非二分法。它承認認同體的解構既擴大政治的領域 (domain of the political) 以納入認同體被建構的方法，並包括正面肯定現有認同體形成的改變，及認同體的替代性累積，以及政治的可能性。批判的建構主義則是猶豫地主張這樣激進的邏輯，而是強調以確保認同體的某些面向，作為支持分析的方法；並複製某些主流理論的觀點。³²因此，Campbell 堅持後結構主義的觀點，強調語言、文化、歷史與科際整合的系絡 (interdisciplinary context)。³³

Campbell 提出不同於知識實存論 (epistemic realism) 所強調的解釋邏輯，而是主張詮釋邏輯，一切都是論述 (discourse)，並且承認歸類 (cataloguing)、計算 (calculating) 與詳細指明 (specifying)「真實原因」的不可能性，以及考量採取某一呈現方式而非另一呈現方式的重大政治後果。³⁴他認為詮釋者的分析與考量決定了一切，³⁵論述不是主體 (subjects) 為了描述客體 (objects) 而用，它構成了主體與客體。³⁶因此，他運用論述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作為其詮釋邏輯的基礎，說明美國的外交政策、波士尼亞戰爭，以及國家暴力等議題。

綜合比較上述四人的科學哲學、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觀點 (如附表)，的確建構主義內部差異相當大，尤其是從 Wendt 的科學實存論而到 Campbell 的反實存論，兩者之間穿插著 Checkel 與 Adler，這樣的知識論立場位置，能否有相通之處呢？還是有相互對話的可能呢？事實上，建構主義在知識論的主張上，並不認為只有一個單一的知識論而是多元的知識論，差別的只是研究方法而已。Wendt 就說：任何科學研究的

註³² 他主要是以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一書與他本人的 *Writing Security* 作比較，參閱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Rev. 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pp. 217~227, 287. David Campbell, *National Deconstruction: Violence, Identity, and Justice in Bosnia*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註³³ David Campbell, "Poststructuralism," in Tim Dunne, Milja Kurki,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03~228.

註³⁴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p. 4.

註³⁵ 他說：「危險不是一個客觀的境況 (condition)，不是獨立存在於人們之外的事物，即使對這些人，危險可能變成威脅。」：「沒有一件事本身是一個風險，事實上，是沒有風險；但另一方面，任何事都可以是風險，全賴如何分析這風險，如何考量這事件。」：「詮釋的重要功能是以特定的再呈現樣式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將危險具體化的方法」，換言之，風險是詮釋者詮釋的效果。參閱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p. 1, p. 2.

註³⁶ David Campbell, "Poststructuralism," p. 217.

知識權威 (epistemic authority)，即是決定選用詮釋方法或實證方法，端賴公開可用的證據與研究結論能被否證的可能性。³⁷這或許也指出解除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差異或焦慮並不需要「定於一尊」，即是爭論 Wendt 的主流建構主義，反而是允許各種不同的知識論主張之間相互的對話。

Wendt、Checkel、Adler 和 Campbell 觀點比較表

	Wendt	Checkel	Adler	Campbell
科學哲學觀點	科學實存論	科學實存論	務實實存論 (實用主義)	反實存論
本體論觀點	本體論優先於知識論	知識論重於本體論	認知演化的社會本體	相互主體的論述建構 客觀世界的存在
知識論觀點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科學多元化的實證主義； 2.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沒有不同，科學解釋也可運用在社會科學； 3. 解釋與理解之間沒有差異，因果解釋鼓勵務實的研究途徑，構成理解則是不適用因果推論，要以經驗證據來判斷。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關注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以過程追蹤的研究方法與科學實存論作為建構主義內部知識論基礎； 2. 各類型建構主義相互協助； 3. 混合實證主義與實證主義。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集中於建立實質理論，加強發展其細部的基礎； 2. 發展務實的演進途徑而非模倣自然科學。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反對知識實存主義； 2. 主張詮釋邏輯，以論述分析作為基礎； 3. 論述不是主體為了描述客體而用，它構成了主體與客體。
方法論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多元、折衷的方法論； 2. 研究是問題導向而不是方法導向； 3. 質化形式理論方法或量化方法都可以。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建構主義之間的方法論爭論未來將超越知識論爭論； 2. 概念多元主義及後設理論多元主義鼓勵相互對話與學習。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建立一致的方法論基礎，並減緩其知識論與本體論的爭論； 2. 以認知演進過程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與的方法論整體主義。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一切都是論述； 2. 論述分析法； 3. 歷史再呈現。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參、解除建構主義內部知識論的焦慮

誠如上述，建構主義內部由於知識論的主張並不一致，有不在乎知識論的 Wendt，也有尋求知識論共識的 Checkel 與 Adler，以及反對知識論存在的 Campbell。這樣的歧異立場，更使得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焦慮難以解除。諷刺的是，這樣的焦慮反而集中在對 Wendt 的批評，使得 Wendt 遭受左右攻擊，既要遭受來自理性主義主流理論的攻擊外，也遭受到反思主義的攻擊；不僅如此，更要遭受建構主義內部的攻擊，尤其是他以科學實存論作為其科學哲學立場的觀點，Wendt 也積極回應這些攻擊，尤其是他提出量子社會科學的理論為因應。

註³⁷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372~373.

其次，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焦慮也集中在主張建立中間道路的主流（溫和）建構主義，是否意味著尋求知識論的共識比尋求統一的知識論是較為容易的，也較能解除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焦慮。但 Stefano Guzzini 則是主張應該尋求建構主義的共同後設理論立場，這又是另一種不同的觀點。³⁸

一、學者對 Wendt 科學實存論的批判與其回應

誠如上述，現代（溫和）建構主義學者 Wendt 以科學實存論作為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知識論基礎，但隨著他成為主流的建構主義者，遂不斷有學者就其科學實存論提出批評，因此對 Wendt 科學實存論的批評也就成為第四次大辯論中，節外生枝的特殊議題，值得關注學者之間對此議題的爭論主張，有助於理解哲學論述對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影響。這些學者認為科學實存論式與建構主義是不相容的，³⁹而提出批判實存論（critical realism）作為新的知識基礎，⁴⁰例如 Colin Wight 就以批判實存論重新探究「行為主體與結構的爭論」（agents vs. structure debate）。⁴¹從科學實存論而至批判實存論，乃至批判科學實存論，這本身是哲學界的爭論蔓延至國際關係理論界，⁴²由於 Wendt 成為主流建構主義學者，批判科學實存論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的熱門議題之一。⁴³

Steve Smith 同意反思主義與理性主義之間的隔閡，能以建構主義作為橋樑、中間

註³⁸ Stefano Guzzini, "A R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2 (2000), pp. 147~182.

註³⁹ Milan Brglez, "Reconsidering Wendt's Meta-Theory: Blending Scientific Realism with Social Constructiv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4, No. 4 (2001), pp. 339~362; Fred Chernoff, "Scientific Realism as a Meta-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 2 (June 2002), pp. 189~207.

註⁴⁰ Heikki Patomaki and Colin Wight, "After Postpositivism? The Promises of Crit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No. 2 (2000), pp. 213~237; Heikki Patomaki, *Af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ritical Realism and the (Re)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註⁴¹ Colin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as Ont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註⁴² 有關科學實存論與批判實存論在哲學界的發展，參閱 Heikki Patomaki, "After Critical Realism? The Relevance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Version 26.2.2008) <http://www.helsinki.fi/oik/globalgovernance/Mallisivusto/tutkimus/After_Critical_Realism_HP23_%5B1%5D.pdf>; Robert Klee,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Cutting Nature at Its Sea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莊錦農、魏中平，「解釋與批評：論批判實存論的科學解釋觀」，*政治科學論叢*，第 9 期（1998 年 6 月），頁 121~144。有關批判科學實存論觀點，參閱 Ilkka Niiniluoto, *Critical Scientific Re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註⁴³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則是釐清與矯正國際關係理論對於科學實存論的誤解，尤其是 Wendt 引起的科學實存論影響。參閱 Jorge Rivas, "Realism is not a Via Media between Positivism and Interpretiv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29 March 2008, San Francisco.

道路，以呈現反思主義與理性主義的綜合。^④但是因為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是不能結合在一起，這是由於他們具有相互排斥的（知識論）假設。^⑤他反對 Wendt 以科學實存論混合兩者，他並特別重視兩者在知識論的辯論，並認為國際關係理論需要基於後實證主義內各種不同的知識論，發展強烈的後實證理論而結合建構主義。^⑥

Heikki Patomaki 和 Colin Wight 則指出 Wendt 嘗試在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之間建立中間道路是無法支持的，因為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並不是兩極相反的，它們都是以哲學的反實存主義論述為基礎。當前的國際關係理論，包括實證論者、建構主義論者及後結構論者，無論是以解釋與理解、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等相對論述，都是源自於國際關係中「後康德－休謨式」的「問題－領域」（problem-field），即是這些反實存主義藉由 David Hume 和 Immanuel Kant 構成這樣的領域，就是以對其本身可能性的非常特定及有限的理解，去建構對國際關係理論的特定理解。他提出「批判實存論」（critical realism）重新思考此領域，以突破休謨的懷疑論（skepticism）與康德的超理念論（transcendental idealism）。它主張本體實存論、知識相對論與理性判斷論，即是分殊化（differentiated）、結構的（structured）與層次的（layered）實體獨立存在於人類思想（mind）之外；所有的信念都是社會地產生，並且有可能是容易錯誤的；但仍能提供檢證基礎（justifiable grounds）判斷或選擇理論。因此，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議題上，如理論的不可共量性、因果性、行為主體與結構、分析層次與價值及事實，批判實存主義能使國際關係理論脫離「問題－領域」。^⑦

Fred Chernoff 認為 Wendt 以科學實存論發展國際關係理論的動機是失敗的，主要是 Wendt 並不了解科學實存論。Wendt 以為科學哲學學者對科學實存論已經有共識，而且所有科學實存論學者也對知識論爭論轉向本體論爭論有所共識，事實並非如此。甚至，Wendt 所引述的科學實存論學者 Hilary Putnam，後來也放棄了科學實存論。1960 年代，科學實存論是自然科學的主流成為自然科學實存論，但並未擴展成社會科學實存論。還有許多其他的哲學基礎錯誤，例如實證主義、反實存論、理論選擇基準，以及本體論與知識論辯論等。總之，Wendt 對科學實存論的理解是錯誤、過時的，並以錯誤描述（mischaracterizing）社會科學哲學辯論的特質，達成其科學實存論

註④ 他將「非實證論」的理論（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規範性理論、批判理論、歷史社會學）歸類為反思主義，而將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辯論歸類為理性主義內的辯論。Steve Smith, "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83~188.

註⑤ Steve Smith, "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86.

註⑥ Steve Smith, "Positivism and Beyond,"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1~44.

註⑦ Heikki Patomaki and Colin Wight, "After Postpositivism? The Promises of Crit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No. 2 (June 2000), pp. 213~237.

的主張。^{④⑧}

Silviya Lechner 認為 Wendt 對科學實存論、自然主義與心物二元論的承諾是有問題的 (problematic) 而使其無法發展出邏輯一致的建構主義理論，而且使其關於相互主觀性、理念與語言特性的主張是沒有支撐的 (untenable)。因為 Wendt 將科學實存論等同於自然主義，但科學實存論並不都是基於自然主義的前提，自然主義也無法將社會世界概念化，因為社會世界是個雙重詮釋的世界，一個由理念或語言所構成的相互主觀世界，這是 Wendt 建構主義的致命缺失。科學實存論者並不能作為建構主義者理論化的概念平台，因為它在自然世界的概念優勢轉移至社會世界時，反而變成劣勢。^{④⑨}

Friedrich Kratochwil 質疑 Wendt 對科學實存論的解釋是否適當，以及質疑 Wendt 的科學實存論能否作為建構主義的後設理論取向，批評 Wendt 以科學實存論連結建構主義，他認為這兩者是不相容的，而且 Wendt 是用大多數科學實存論者早已丟棄的科學概念堆砌，這是一個失敗的「婚姻」。更以塗鴉 (scrabble) 遊戲作為隱喻通則化知識與建構主義挑戰的困境，認為是不需要中間道路 (middle ground or via media)，也是不需要新的正統理論。^{⑤⑩}知識論與本體論並不是相互獨立，但藉由論述的語言 (概念) 結構而緊密連結，知識 (knowledge) 不應只有一個致知 (knowing) 方法，尤其因為即使在科學內仍存有許多不同的依據，因此不能歸併成只有一個 (科學實存論) 基準。^{⑤⑪}

Stefano Guzzini 和 Anna Leander 批評 Wendt 將國際政治理論予以綜合的企圖，認為他只是一位收藏家 (gatherer) 並非獵人 (hunter)，是在一個他自己的國際關係社會理論內抽象、重新裝配與同化明顯敵對的理論立場。他這樣的綜合是需要克服與保持既有的矛盾，像是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在牛頓物理學的情況一樣，但 Wendt 不甘如此，而是運用粒子 (particles) 與波的雙元互補性，即是光有時像粒子運動，有時像波運動。他攻擊的標的 (target) 是以物質主義與個體主義為基礎的國際關係理論正統，但他卻是有意待在此學科的正統內，論證其理論異端。即是選擇理論正統的國家主義 (statism)，以及以傳統的國家社會 (society of states) 界定國際政治，這樣的綜合則與其所主張的實證主義無關。^{⑤⑫}

註④⑧ Fred Chernoff, "Scientific Realism as a Meta-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89-207.

註④⑨ Silviya Lechner, "Missing Epistemology: The 'Social' and the 'Theoretical' in Wendt's Social Theor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4th CEEISA in Tartu, Estonia, 25-27 June, 2006.

註⑤⑩ Friedrich Kratochwil, "Constructing a New Orthodoxy? Wendt's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Millennium*, Vol. 29, No. 1 (2000), pp. 73-101; Friedrich Kratochwil, "Constructing a New Orthodoxy? Wendt's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21-47.

註⑤⑪ Friedrich Kratochwil, "Constructing a New Orthodoxy? Wendt's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p. 73.

註⑤⑫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Wendt's Constructivism: a Relentless Quest for synthesis,"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ndt and his cr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73-92.

因此，著名的國際關係研究期刊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在 2006 年第 35 卷第 2 期中，特別以「國際關係中的科學實存論與批判實存論」(the Forum on Scientific Realism and Critical Realism in IR) 為題，邀請不同學者進行討論。^{⑤③}誠如該期編輯們所指出的：「大多數的國際關係學者仍不熟悉於科學實存論與批判實存論的研究議程 (agendas)、解釋方法，以及兩者與現有的國際關係研究途徑之間的差異，同時現有的國際關係研究途徑至今仍未能以批判的建設性態度與科學實存論與批判實存論接觸。」^{⑤④}但這樣的批判是否又會造成建構主義內部的爭論而無利於解除知識論焦慮，或只是另一個知識論主張而已。畢竟，「建構主義研究並不都是一模一樣的。」^{⑤⑤}。

總之，科學實存論者並不能作為建構主義者理論化的概念平台，因為它在自然世界的概念優勢轉移至社會世界時，反而變成劣勢。^{⑤⑥}畢竟，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是有所不同的，社會科學無須也不必要複製自然科學。當然，科學實存論是不會接受這樣的主張。

2000 年第 26 卷第 1 期的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以 Wendt 的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書作為論壇的題材，邀請國際關係學者 Robert O. Keohane、Stephen D. Krasner、Roxanne Lynn Doty、Hayward R. Alker 及 Steve Smith 等人撰文評論，^{⑤⑦}針對這些學者的批評觀點，尤其是有關「中間道路」的問題，Wendt 提出回應，他認為本體論決定了知識論，而非知識論決定本體論。「中間道路」是在重視理念而未排除科學的各種立場之間尋找一條路，理念是可以科學地研究，即是嚴謹地實質理論化經驗世界。^{⑤⑧}他並引用社會學的結構化理論與社會互動理論解釋社會實體建構的過程，強調相互主觀意義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認為解釋與理解之間並無知識論的差異，但因果性的理論化與構成性的理論化之間則有方法論的差異，這反映出兩者所要回答的問題差異。^{⑤⑨}

後來 Wendt 引用量子意識理論 (quantum consciousness hypothesis)，說明理念也可以進行科學研究，為其所引發的批評與討論提出辯護，並以波與粒子雙元性關係 (wave-particle duality)、波函數崩陷 (wave function collapse)、測量問題 (the

註⑤③ Editors of *Millennium Journal*.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the Forum on Scientific Realism and Critical Realism in IR,"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No. 2 (2007), pp. 379-398.

註⑤④ *Ibid.*, p. 379.

註⑤⑤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Keohane and Stephen Kras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2 (1998), p. 680.

註⑤⑥ Silviya Lechner, "Missing Epistemology: The 'Social' and the 'Theoretical' in Wendt's *Social Theor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4th CEEISA Conference in Tartu, Estonia, 25-27 June, 2006.

註⑤⑦ Editor, "Forum on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1 (2000), pp. 123-180.

註⑤⑧ Alexander Wendt, "On the Via Media: A Response to the Cr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1 (January 2000), pp. 165-166.

註⑤⑨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85-88.

measurement problem)，以及非局部性（non-locality）說明社會科學探索的身心（mind-body）問題，即是社會科學的本體論與知識論觀點，而成為一個量子社會科學（或社會物理學），以此主張其科學實存論的觀點。^⑩也就是說，他是科學一元論的知識論觀點，認為主張國際研究應重視本體論的爭論而非知識論的爭論，後者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本體論是重於知識論，國際研究的主流理論（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所差異的是本體論而非知識論。但就建構主義而言，Wendt 所忽視的知識論爭論則就顯得更有意義了。^⑪James F. Keeley 就指出 Wendt 轉向量子理論是高風險的探險，其所完全呈現的量子意識理論尚未可用，因此，他是一位探險家。^⑫Barry Buzan 認為 Wendt 提出量子社會（科學）理論作為攻擊回應，以避免兩線作戰，這是一種報復的新國際關係（理論）（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th a Vengeance.）。^⑬

二、知識論的共識何在？

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差異，甚至建構主義內部的溝通也是以現代（溫和）建構主義為主。為什麼會這樣？根據 Checkel 的看法是因為：第一，學者不願意建立多線道的理論綜合，這會遭到建構主義內部學者與外部學者的批判評論；第二，實務上，建立多線道橋樑是耗時與困難的；第三，知識論是不易理解，整合不同的建構主義不易維持知識的一致性；第四，探索建立中間地面是窄化或封閉了理論探索的空間。^⑭因此，嘗試建立在現代（溫和）建構主義的科學實存論的知識論一致性或統一是不可能的、不必要的，也是不容易的。不如尋求知識論的共識，也就是承認知識論的多元性，承認建構主義沒有共同的知識論基礎。

其實，建構主義只是世界的另類（alternative）本體論、重述（redescription），它不主張去解釋事物之理，也無意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主導理論，它沒有既定的意識形態立場。^⑮因此，在知識論上，建構主義雖不至於遵循 Paul Feyerabend 的「什麼都可以！」（Anything Goes）^⑯科學無政府主義的知識論立場，任何的知識論主張都可以，

註⑩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 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ndt and his critics*, pp. 189-205.

註⑪ 最近幾年 Wendt 開始關注於外星人智慧（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ETI）的研究，包括人類對飛碟（UFO）一無所知的知識論議題，藉以解釋為什麼現代國家有系統地抗拒接受有外星人存在及航行至地球的觀念。由此可知，Wendt 對於知識論的輕視或反諷方式。

註⑫ James F. Keeley, "To the Pacific? Alexander Wendt as Explorer," *Millennium*, Vol. 35, No. 2 (2007), pp. 417-430.

註⑬ Barry Buzan, "Series editor's Preface,"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ndt and his critics*, p. xvi.

註⑭ Jeffrey T. Checkel, "Social Constructivisms in Global and European Politics," *Arena Working Papers*, WP 15/03 (2003), pp. 15-17.

註⑮ Vendulka Kubalkova,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p. xii.

註⑯ 有關 Paul Feyerabend 的科學哲學無政府主義觀點，參閱 Paul K.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London: Verso Books, 1978/1990); Paul K. Feyerabend,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1990).

而是應該考量在不同的本體論與方法論系絡內選擇知識論立場，不同的知識論立場有其優劣，端賴其在此系絡的效度 (validity)。或許更具體而言，應是考量經驗性研究的議題適用的問題，建構主義所提供的理論主張多是後設理論，缺乏經驗性研究的應用，但隨著越多的建構主義學者整合其他理論的主張進行經驗性研究，建構主義成爲一個廣泛的社會研究架構，某種程度上更不會強調唯一的知識論立場，而是希望藉由多元的知識論豐富建構主義的理論效度。

換言之，也就是建構主義所建築的橋樑是可以有不同的組成樣式，可以是現代主義式也可以是後現代主義式的多線道橋樑。建構主義在知識論的主張上，並不認爲只有一個單一的知識論而是多元的知識論，差別的只是研究方法而已，如「過程追蹤」、^⑦「回饋迴路」(feedback loops)、歸類技巧 (bracketing techniques) 等研究方法，^⑧也就是接受建構主義理論概念、知識論的差異與方法論 (研究方法) 的多元，以鼓勵建構主義之間的對話與相互學習，就更能解除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焦慮。這樣的研究方法多元論觀點會在後文中詳細說明，學者所提倡的若干研究方法。

肆、建構主義的多元方法論

相較於建構主義本體論與知識論的研究，建構主義的方法論則較不受到學者關注，即使是建構主義學者也對於方法論抱持著忽視的態度。僅是爭論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之間的議題，^⑨這是因爲國際關係理論向來對於方法論並不關注，^⑩更是缺乏令人

註^⑦ Andrew Moravcsik 和 Checkel 曾就過程追蹤方法進行辯論，參閱 Jeffrey T. Checkel, "From Meta-to Substantive Theory?: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Study of Europe,"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 2, No. 2 (2001), pp. 219~226; Jeffrey T. Checkel, "Constructivism and Integration Theory: Crash Landing or Safe Arrival?",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 2, No. 2 (2001), pp. 240~249; Andrew Moravcsik, "Bring Constructivist Integration Theory Out of the Clouds: Has it Landed Yet?"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 2, No. 2 (2001), pp. 226~240.

註^⑧ Jeffrey T. Checke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ARENA Working Paper*, WP06/06;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onclusions and Extensions: Toward Mid-Range Theorizing and Beyond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2005), pp. 1013~1044;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註^⑨ 例如同屬建構主義的哥本哈根學派 (現代建構主義) 學者 Barry Buzan 及 Ole Wæver 與批判性學派 (後現代建構主義) 學者 Bill McSweeney 之間的爭論，後者以個體主義批評前者的整體主義，兩者相互指出對方誤解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後者強調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是互補的。Bill McSweeney, "Identity and Security: Buzan and the Copenhagen Schoo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2, No. 1 (1996), p. 84;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Slippery? Contradictory? Sociologically Untenable? The Copenhagen School Repl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3, No. 2 (April 1997), pp. 244~245; Bill McSweeney, "Durkheim and the Copenhagen School: A Response to Buzan and Wæv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1 (January 1998), pp. 138~140.

註^⑩ 但仍有少數學者關注此議題，參閱 Detlef F. 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 eds., *Models, Numbers and Cases: 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 Harvey, eds., *Evaluating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n Arbor,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滿意的建構主義方法論討論，以及缺乏完整的各種建構主義方法論。不免有學者要提出「是否有一個為經驗研究的建構主義方法論？」的問題，^①建構主義方法論是涉及如何進行建構主義式的研究，而不是指涉建構主義的哲學研究，不同類型的建構主義而出現不同的方法論。例如現代或實證建構主義認為相互主觀意義是穩定的，而且是由詮釋者觀點所維持不變的，而有自變數、中介變數與依變數組成的因果機制，遂以過程追蹤法追蹤此因果過程；後現代或後實證建構主義則是認為相互主觀意義是不穩定的，是沒有任何客觀的分析觀點，而是各種論述的實踐，遂以論述分析法追蹤各種不同的歷史臆測（conjunctures）。^②從本體論、知識論而到方法論的研究，遂有些學者嘗試探討建構主義方法論的議題，從提出綜合不同知識論的方法論主張，而進而提出各種不同的研究方法，而到混合不同的研究方法的經驗研究，以呈現建構主義內部的建構計畫。

一、建構主義的方法論觀點

建構主義者在探究行為者的「相互主觀意義」時，由於知識論關注的面向不同而運用了許多各式各樣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過程追蹤、調查（survey）、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實驗、以行為主體為基礎的模式模擬（agent-based modeling）、認知繪圖（cognitive mapping）、系譜（探源）學（genealogy）、結構的焦點比較、訪談、參與觀察等，甚至是混合運用這些研究方法。^③

Vincent Pouliot 認為建構主義的方法論應該是演繹的、詮釋的與歷史的方法論，而且對建構主義而言，後基礎論（postfoundationalism）比科學實存論更為一致的後設理論，能作為混合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後設理論，即是發展主觀知識與被客觀化的知識。他以「主客觀主義」（subjectivism）稱述這種混合主觀與客觀研究的建構主義方法論。主客觀主義是一種三個步驟的方法論，但不是直線性路徑是可以前後反覆的路徑；第一個步驟是運用演繹方法發現行為主體的主觀意義；第二個步驟是運用詮釋方法將此主觀意義置入於系絡之內，而將之客觀化；第三個步驟是導入時間與歷史而將此主觀意義進一步客觀化。^④

註①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Taking Stock: The Constructivist Research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2001), pp. 319-436.

註② Audie Klotz and Cecelia Lynch, "Translating Terminolog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8, No. 2 (2006), pp. 356-357.

註③ Rawi Abdelal, Yoshiko M. Herrera,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se McDermott, "Identity as a Variabl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4, No. 4 (December 2006), pp. 695-711;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Taking Stock: The Constructivist Research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2001), p. 395.

註④ Vincent Pouliot, "'Subjectivism': Toward a Constructivist Methodolog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2 (2007), pp. 359-384. 尤其是 pp. 368-374.

Audie Klotz 和 Cecelia Lynch 更是提出如何進行建構主義研究的策略，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總體歷史比較、系譜學、參與觀察、敘述、框架、民俗學、過程追蹤）探索建構主義所關注的議題（結構、行為主體性、認同與利益），藉以增強建構主義學者之間的對話。^⑤ Amir Lupovici 有系統地混合了傳統的質化方法與詮釋方法的過程追蹤、論述分析與相反事實（counterfactuals）等三種研究方法，以尋求建構主義一致的方法論。^⑥他以過程追蹤法建立變數的時間變化與共變，以論述分析理解社會建構，以相反事實法建立變數之間的關係，混合過程追蹤法與論述分析法以建立變數的系絡，混合相反事實法與論述分析法建立變數之間的關係，混合相反事實法與過程追蹤法建立變數的因果性，整個研究方法的混合在說明組成效果與因果效果之間的關連。^⑦

誠如 Finnemore and Sikkink 所言：沒有單一的建構主義方法或研究設計，建構主義開放了一套的議題，而學者選擇最適合他們特定問題的研究工具與方法。^⑧即使是運用量化測量的工具與方法，也不是對立於建構主義，建構主義學者也可以有效地運用統計證據描述與分析語言的特質與模式，只要這些數據仍對社會經濟系絡有所關鍵就可以運用統計證據。^⑨換言之，建構主義並沒有主張特定的研究方法，或是限定只能使用一種研究方法，而是混合運用各種研究方法。

二、現代建構主義的研究方法－過程追蹤法為例

誠如上述，建構主義學者並未特別關注方法論的議題，但是由於 Checkel 近年致力於過程追蹤法結合「國際社會化」概念，而使過程追蹤法成為現代建構主義學者重視的研究方法之一。Checkel 認為質化的過程追蹤個案研究法，是現代建構主義典型的方法論起點。^⑩Wendt 在說明其科學實存論的因果機制時也以過程追蹤法作為其描述的核心，並以過程追蹤法說明行為主體與結構的變遷，藉以說明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並無對立而是關注社會過程的不同層面。^⑪

過程追蹤法是屬於個案研究法的範疇，個案研究法具有找出新的或被刪除的變數

註⑤ 總體歷史比較、系譜（探源）學、參與觀察是研究歷史社會結構的變遷，框架、民俗學、過程追蹤則是研究社會結構內部的變遷。參閱 Audie Klotz and Cecelia Lynch,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in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M. E. Sharpe, 2007)。

註⑥ Amir Lupovici, "Methodologizing Constructivism: Modifying Methods and Criteria,"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hicago IL, February 28-March 3, 2007.

註⑦ Amir Lupovici, "Methodologizing Constructivism: Modifying Methods and Criteria," pp. 18-19.

註⑧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Taking Stock: The Constructivist Research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p. 396.

註⑨ Audie Klotz and Cecelia Lynch,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in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08.

註⑩ Jeffrey T. Checkel, "Constructivism and EU Politics," in Knud Erik Jorgenson, Mark Pollack, and Ben Rosamond, eds., *Handbook of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London: Sage, 2007), p. 58.

註⑪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82, pp. 313-369.

或假設、檢查個案中的中介變數推論可能的因果機制、發展特定個案的歷史解釋、獲取較高層次的建構效度，以及運用偶發的通則將複雜的關係予以模型化等優勢。⁸⁰個案研究法可分為單一個案研究或個案比較研究，前者是就單一個案進行研究，運用過程追蹤法、一致性檢驗（congruence testing）法與反事實推論（counterfactual analysis）法；後者則是以結構比較法與聚焦比較法發展出類型（typological）理論。⁸¹

過程追蹤法是運用在個案研究內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嘗試追蹤可能原因與觀察結果之間的關聯。在過程追蹤法中，研究者檢視歷史、檔案文件、訪談稿與其他資料來源，以觀察一個理論在一個個案中所假設的或隱含的因果過程，是否真正地明顯出現在後續的中介變數及其數值上。⁸²也就是找出獨立變數與依賴變數之間的中介因果過程（因果鏈或因果機制），它強迫研究者將殊途同歸性（equifinality）納入考量，即是考慮結果所產生的另類路徑，以及提供描繪出在單一個案中與結果及過程追蹤證據相一致的因果路徑的可能性。⁸³因此，它重視的是理論假設原因與觀察結果之間的中介變數。⁸⁴這中介變數即是因果過程，藉由運用因果過程的觀察來分析因果關係。亦有學者以總括（colligation）、敘述解釋（narrative explanation）、模式符合（pattern-matching）、序列解釋（sequential explanation）、起源解釋（genetic explanation）與因果鏈解釋（causal chain explanation）稱呼這樣的因果推論法。⁸⁵

運用過程追蹤法通常意味著追蹤因果機制在特定狀況下的運作，其資料絕大多是質化的性質，例如歷史記憶、訪談、新聞報導與文件，其優點在於過程與互動，缺點則是建立結構的系絡，最大的挑戰是它需要大量的資料與時間。⁸⁶知識論上，過程追蹤法與後實證主義的哲學基礎是不相容的，但卻是相容於科學實存論，因為科學實存論是知識論的投機者，它認為沒有一個方法或知識論可以適用於所有的個案，因此，它既可以給予過程追蹤法概念基礎，也可以創造廣大的知識論平台使傳統建構主義者與

註⁸⁰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y Methods: Design, Us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Detlef F. 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 eds., *Models, Numbers and Cases: 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9.

註⁸¹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y Methods: Design, Us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Detlef F. 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 eds., *Models, Numbers and Cases: 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2-33; Alexander L.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MIT Press, 2005), pp. 67-72.

註⁸² Alexander L.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 p. 6.

註⁸³ *Ibid.*, pp. 206-207.

註⁸⁴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y Methods: Design, Us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Detlef F. 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 eds., *Models, Numbers and Cases: 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2-24.

註⁸⁵ John Gerring, "Comparability: A Key Issue in Research Design," *Political Methodology Committee on Concepts and Method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4 (2005), p. 11, note 12.

註⁸⁶ Jeffrey T. Checkel, "It's the Process, Stupid! Process Tracing in the Study of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RENA Working Paper*, WP 05/26, p. 6.

詮釋建構主義者相結合。⁸⁸但過程追蹤法仍是可以運用量化的觀察來分析因果關係，量化或質化的觀察並不是其差異所在，而是其不可比較性（*uncomparability*），也就是不能與其他個案相比較，它只運用在研究者嘗試在單一個案內重新建構事件序列。⁸⁹

依據 George 和 Bennett 的主張，過程追蹤法有四種不同類型：詳細敘述（*detailed narrative*）、使用假設與通則、分析的解釋，以及較一般的解釋。⁹⁰

（一）詳細敘述（*detailed narrative*）

這是最簡單的程序追蹤法，它是以紀年史方式呈現事件如何發生的過程，其敘述並沒有明確的使用理論或理論相關的變數。歷史的紀年敘述就是隱含的、非理論的過程追蹤法，它是發展較具理論型態的過程追蹤法，必要或有用的步驟。良好建構的詳細敘述能指出可能的因果過程，而使研究者能決定何種過程追蹤法與較有理論取向的解釋是有關的。

（二）使用假設與通則

在較具分析形式的過程追蹤法中，其部份的敘述是伴隨著明確的因果假設，而沒有運用理論或是嘗試將個案解釋衍伸（*extrapolate*）成通則。另一個更具分析形式的過程追蹤法則是運用一些通則作為解釋結果的支撐，或是特定的歷史解釋變成通則或以一般模式作為例證展示。

（三）分析的解釋

歷史敘述的程序追蹤法轉變成以理論形式表達的分析因果解釋式的過程追蹤法，其轉變的程度有所不同，或是慎選的而要成為適當或簡潔解釋的重要部分，或是部分解釋反映出研究者無法明確說明或確立假設過程中的一切步驟，或無法找到資料紀錄每個步驟。

（四）較一般的解釋

這類的程序追蹤法是研究者建構較為一般的解釋而不是詳細追蹤因果過程，因為研究者缺乏詳細解釋所需的資料、理論或定律，或是因為研究目標要以較高的通則性與抽象性表達解釋。

根據 Checkel 個人運用過程追蹤法進行研究的經驗，認為有助於帶入因果機制、掌握先制之便（*first move advantage*）的問題、促進建立理論之間的溝通橋樑、有助答覆需要多少資料才足夠的問題、理論薄弱、實踐不易、耗時、不知過程終點、喪失全

註⁸⁸ *Ibid.*, p. 22.

註⁸⁹ John Gerring, "Comparability: A Key Issue in Research Design," *Political Methodology Committee on Concepts and Method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4 (2005), pp. 11-14.

註⁹⁰ Alexander L.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 pp. 210-212.

景、必須審慎解釋知識論的假定等優缺點，但它必須以方法論的多元論為其哲學基礎，並運用此多元論審慎地重新建構因果過程也未喪失結構—論述—倫理系絡的洞察力，以及在方法論上發展與審慎驗證一套的代理（proxies）用以呈現因果機制，並重視殊途同歸性，考量已經產生後果的替代路徑。^⑳ Checkel 認為過程追蹤法可以超越非此即彼（either/or）的後設理論辯論而經驗性運用在行為主體與結構事務，並藉由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知識論及方法論而被理解與被解釋。^㉑

三、後現代建構主義的研究方法—以論述分析為例

由於傳統（現代、主流）建構主義致力於建立中間道路而忽略了語言在國際關係分析的重要性，^㉒後現代建構主義學者遂強調論述分析的研究方法。論述分析是要展現文本（textual）程序與社會程序的交織互聯過程，以及在特定系絡下描述這交織互聯過程對我們思考方式與在當代世界行動的啟示。^㉓論述分析源自後結構主義學者 Jacques Derrida、Michel Foucault 的觀點，Derrida 認為一切皆是文本，文本之外無他物。文本必須予以徹底解構，以使其清楚地顯露出其間的「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蹤跡，以避免語言陷入二元對立的封閉系統。現象是透過語言的論述意指（signification）關係而出現（presence），即是現象或事務並不會傳遞任何意義，而是人利用符號系統建構其意義（meanings）。意指分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兩種不同的因素，其實它們是同一個符號。當傳統文化用「能指」去指涉或表現「所指」的時候，其實是用某種呈現「出現」的「能指」，去指涉某種「未現」（absence）的「所指」。而當「所指」能夠「出現」的時候，原來用來間接指涉的「能指」，卻又不見了，變成「未現」了。

傳統西方文化都是在利用語言的「能指」和「所指」的「出現／未現」的把戲。並且藉此把戲，進行各種知識和道德價值觀的建構，並且賦予某種典範的與標準化的意義系統。所以，必須徹底揭露「能指」和「所指」這種「出現／未現」的性質，以及這種把戲背後的虛假性和虛幻性，才能夠徹底解構其維護統治階級真理體系的詭計。^㉔而 Foucault 則是主張一個文本的最好的閱讀方法，是參照它的系絡（context）而閱讀，將它視為一系列構成知識特定空間和時間所建構之更大論述實踐的組成部分。

註^⑳ Jeffrey T. Checkel, "Tracing Causal Mechan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8, No. 2 (2006), p. 363.

註^㉑ Jeffrey T. Checkel, "Tracing Causal Mechan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8, No. 2 (2006), p. 363.

註^㉒ K. M. Fierke, "Links Across the Abyss: Language and Logic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 3 (2002), pp. 331-354.

註^㉓ Jim George, *D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 A Critical (Re)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4), p. 191.

註^㉔ 邏各斯（logos）概念出自古希臘時期哲學家 Heraclitus，認為在萬事萬物中存在著永恆的邏各斯，也就是讓萬物統一起來的最高法則。有關 Derrida 的文本性觀點，可參閱高宣揚，*後現代論*（台北：五南，1999年）。

Foucault 認為一切類型的文本，都是歷史和系絡所使然，這也就是論述的機制。Foucault 認為論述的機制是在權力關係中造就出論述的實踐。權力不是什麼制度，也不是什麼結構，也不是一些人擁有的什麼勢力，而是人們賦予某一個社會中，複雜的戰略形勢的名稱。論述與權力之間的關係是相互影響，權力的消長影響了論述的結構，論述的機制反映了權力的變化。其中「論述順序」(the order of discourse) 更是重要，它構成我們知識意願的規則、系統與程序，它也是由我們的知識意願所構成的。論述實踐界定了知識媒介 (agent of knowledge) 的合法性觀點，以及確定了各種概念與理論的規範。⁹⁷

論述分析法重視實務的運作，亦即解釋論述的相互主觀產生過程，其中主要是解釋國際關係主要論述如何運作的過程，根據 Jennifer Milliken 的研究認為論述分析法有三種方法：解構法、並列法 (juxtapositional method)、衍生並列法、(genealogical method)。隨著第三次大辯論的影響，國際關係學者引進後結構主義的觀點與論述分析法，例如研究外交政策與國際安全等議題，⁹⁸ Andrew P. Cortell 和 James W. Davis Jr. 甚至認為在研究國際規範上論述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不僅是因為它優於指出國際規範特質的其他變遷，也是因為它闡明違背國際規範的行為被排除的過程。⁹⁹ Thomas Diez 以論述分析探討歐洲的整合與治理，並創立了「論述節點」(discourse nodal points) 的概念，藉由英國的歐洲政策為例，批判地理解歐洲整合的狀況。¹⁰⁰ Peter Wennersten 以論述分析研究波羅的海國家加入 (inclusion) 歐盟的過程，以呈現其加入過程的政治現實。¹⁰¹ Alexander Brand 以論述建構主義 (discursive constructivism) 觀點探究媒體建構國際關係南北國家之間關係的權力競爭過程。¹⁰² 誠如 Thomas Ditz 所說論述分析雖不代

註⁹⁷ 有關 Foucault 的論述觀點，參閱尚衡譯，*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 (台北：桂冠圖書，1998年)；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 (台北：桂冠圖書，1992年)。

註⁹⁸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David Campbell, *Politics without Principles Sovereignty, Ethics, and the Narratives of the Gulf War*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3); Henrik Larsen, *Foreign Polic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French, Britain, and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1997); Lene Hansen, *Security as Practic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 War* (London: Routledge, 2006); Roxanne Lynn Doty, "Foreign Policy as Social Construction: A Post-Positivist Analysis of U.S. Counterinsurgency Policy in the Philippin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3 (1993), pp. 297-320.

註⁹⁹ Andrew P. Cortell and James W. Davis Jr., "Understanding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orm: A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 No. 1 (2000), pp. 65-87.

註¹⁰⁰ Thomas Diez, "Europe as a Discursive Battleground: Discourse Analysi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Studi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6, No. 1 (2001), pp. 5-38.

註¹⁰¹ Peter Wennersten, "The Politics of Inclusion: The Case of the Baltic Stat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4, No. 3 (1999), pp. 272-296.

註¹⁰² Alexander Brand, "Contested Media Power-Media in North-South Relations Through the Prism of Discursive Constructiv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7th Annu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vention "The North-South Divid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n Diego/Calif., March 22-25, 2006.

表主流，但已經被接受是分析國際政治的重要研究途徑，^⑩然而學者之間對於研究論述的最佳方式並沒有共同的理解。^⑪

四、建構主義學者較少使用的研究方法－模式模擬與模糊集合分析法

以行為主體為基礎的電腦模式模擬 (Agent-based Computer Simulation) 是建構具有特定特質 (例如感知外在環境、與其他行為主體溝通互動、判斷與行動等能力) 的行為主體，並將其模擬至實際環境之中，運用電腦程式模擬其與其他行為主體之間的互動。即是運用電腦知識例如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模擬 (Simulation) 等，架構出具體而微的虛擬社會 (Virtual Society)，並深入探究其中所顯現出的社會現象。藉由精確地調控、建構個別的行為主體的特性與行為，以探索行為主體的個體行為 (Micro Behavior) 如何藉由互動而顯現出總體的社會現象 (Macro Phenomena)。也就是說，運用電腦模擬之技術，建構出虛擬的社會，並以行為主體的形式營造其中的行為者，再以人工智慧內演化式計算 (Evolutionary) 中的基因規劃 (Genetic Programming)，來模擬行為者的心智模式 (Mental Model)。^⑫以行為主體為基礎的模式模擬不是以預測為目的，而是以深度理解基本社會過程的運作為目的，^⑬它正逐漸運用於國際研究之中。^⑭

Robert Axelrod 利用許多以行為主體為基礎的模式模擬行為者之間競爭與合作的過程。^⑮David Rousseau 和 A. Maurits van der Veen 運用此方法探索集體認同的形成過程，發現行為主體對自我和對其他行為主體的看法與共享認同體 (shared identity) 的顯現之間是曲線的關係，未穩定的環境促進了共享認同體的顯現，領導者出現在行為主體附近會降低共享認同體的顯現，行為主體互動的複雜性、環境的穩定與領導造成兩極化的社會。^⑯Ian S. Lustick 發展出「以行為主體為基礎的認同體全模式」(the

註⑩ Thomas Diez, "Europe as a Discursive Battleground: Discourse Analysi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Studies," p. 5.

註⑪ Jennifer Milliken, "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que of Research and Method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2 (1999), pp. 225-254.

註⑫ 有關此方面的理論與運用，請參閱 Wikipedia, "Agent-based Model," <http://en.wikipedia.org/wiki/Agent_based_model> (accessed at March 5, 2009).

註⑬ Robert Axelrod, *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 Agent-based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70.

註⑭ Desmond Saunders-Newton, "When Worlds Collide: Reflections on the Credible Uses of Agent-based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Studies," in Neil E. Harrison, ed., *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 New Paradigm* (New York: SUNY Press, 2006), pp. 229-250.

註⑮ Robert Axelrod, *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 Agent-based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註⑯ David Rousseau and A. Maurits van der Veen, "The Emergence of a Shared Identity: An Agent-based Computer Simulation of Idea Diffus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9, No. 5 (2005), pp. 686-712.

agent-based identity repertoire model)，探索全球化與族裔動員、衝突與穩定的關係。⑩
 Matthew J. Hoffmann 運用此模式模擬檢視建構主義學者 Finnemore 和 Sikkink 的國際規範生命週期 (international norms' life of circle)，探討國際有關減少臭氧層消失的規範。⑪

模糊集合分析法 (Fuzzy Sets Analysis) 強調人類的思維、推理以及對週遭事物的認知，其概念都是相當模糊的。也就是說該對象的基準或印象因人而異，該事物的集合的範圍或境界是不明確的集合，許多傳統非常精確的數量方法，已經不能完全解決以人為中心的問題以及較為複雜的問題，必須以模糊集合數學分析法，取代傳統的數量方法來處理模糊的問題。傳統的數學是以一般集合 (crisp sets) 為基礎，而一般集合又是以二值邏輯 (binary logic) (A 或非 A；1 或 0) 為中心觀念，某個元素屬於某個明確定義的集合，則該元素於特徵函數值上為 1，否則就是 0，此一定律謂之「排中律」，即不是 A 就是非 A。但人類事務並非如此，二值邏輯與排中律並不能完全適用，須以模糊集合數學分析法說明，模糊數學是以模糊集合為基礎，模糊集合的定義如下所述：令 U 為討論的全體對象，叫做論域 (universe of discourse)；論域中的每個對象，叫做元素，並以 u 表示； U 上的一個模糊子集 A 是指：對於任意 $x \in U$ 都指定一個數 $\mu_A: X \rightarrow [0,1]$ ，叫做 x 隸屬於 A 的程度，該映射稱為 A 的隸屬函數 (membership function)。加上特性的要素的集合來加以定義，其中 $[0,1]$ 是表示由 0 到 1 的區間內的所有實數值。當 A 的隸屬函數的值域 $= [0,1]$ 時， μ_A 變化成一個普通子集的特徵函數， A 便變化成一個普通子集。當 A 單獨出現或使用時，稱之為模糊集合。其中模糊集合的高度 (height) 是指最大隸屬程度 (degree of membership)。至少有一元素之隸屬程度為 1 的模糊集合，稱為正常化的 (normalized) 模糊集合。簡言之，模糊集合分析法是把人類事務總結成一系列以命題邏輯—「若 (if) ……則 (then)」形式——表示的互動規則，通過模糊集合推理而運用於互動過程，均為一組被量化的模糊語言集合，如正大、負大、正小、負小及零等，而不再是非 1 即 0 的情形。⑫

註⑩ 有關此模擬模式說明與運用，參閱 Solomon Asch Center, "Agent-based Modeling," <<http://psych.upenn.edu/sacsec/research/agent.htm>> (Accessed at September 12, 2008); Ian S. Lustick, "Agent-based Modeling of Collective Identity: Testing Constructivist Theory," *Journal of Artifici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imulation*, Vol. 3, No. 1 (2000), <<http://jasss.soc.surrey.ac.uk/3/1/1.html>> (Accessed at July 30, 2008).

註⑪ Matthew J. Hoffmann, *Ozone Depletion and Climate Change: Constructing a Global Respons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註⑫ Charles C. Ragin, *Fuzzy-Set Social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Michael Smithson and Jay Verkuilen, *Fuzzy Set Theory: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aul Pennings, "Beyond Dichotomous Explanations: Explaining Constitutional Control of the Executive with Fuzzy-Se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2, No. 4 (2003), pp. 541~567.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早已關注模糊集合分析法的運用，^⑩ Frank M. Häge 建議以模糊集合分析法來強化建構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對話與溝通。^⑪ Berthold Rittberger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 以模糊集合法說明歐盟憲法化過程是「社群環境中的策略行動」所出現的條件 (conditions)。^⑫ Martin Binder 也運用模糊集合分析法研究國際人道干預規範，說明各種不同理論之間 (建構主義、現實主義、制度主義) 解釋的綜合與互補。^⑬

綜合上述，無論是現代建構主義或後現代建構主義所常用的研究方法，或是建構主義較為少用的研究方法，都呈現出建構主義的多元研究方法，即使是所謂的質化研究方法與量化研究方法，都可以運用於研究行為主體與結構之間相互建構的過程。

伍、結 論

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爭議或焦慮，Antje Wiener 就以建構主義理論化的馬賽克 (mosaic of constructivist theorizing) 嘗試說明不同知識論立場的建構主義 (傳統、一致與批判) 在探索國際規範性質的整合，以及建構主義與國際法之間的科際整合研究。^⑭ 誠如 Finnemore and Sikkink 分析建構主義學者的研究方法後，指出建構主義與當前社會科學和政治學所使用的方法是相容的，建構主義的特點在於其理論主張而不是其經驗研究的策略。^⑮ 因此，建構主義的知識論爭論或焦慮呈現了其方法論的多元研究方法。無論是何種建構主義都可以混合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即使是量化統計或數理集合的研究方法都是可以運用的。不僅是國際關係理論如此，^⑯ 整個社會科學研

註^⑩ Claudio A. Cioffi-Revilla, "Fuzzy Sets and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5, No. 1 (Feb., 1981), pp. 129-159; Gregory S. Sanjian, "Fuzzy-Sets Theory and U.S. Arms Transfers: Modeling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2, No. 3 (1988), pp. 1018-1046.

註^⑪ Frank M. Häge, "Constructivism, Fuzzy Sets and (Very) Small-N: Revisiting the Conditions for Communicative Action," *Compass Working Papers*, WP2005-33, 2005.

註^⑫ Berthold Rittberger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 "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Explaining the Parliamentar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Paper prepared for EUSA Ninth Bienni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ustin, 31 March - 2 April, 2005.

註^⑬ Martin Binder, "The Limits of 'Humanitarian' Norms: Exploring the Selectivity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fter the Cold Wa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San Francisco, CA, March 26-29, 2008.

註^⑭ Antje Wiener,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uzzles and Promises," *Constitutionalism Webpaper*, Con WEB No. 5/2006.

註^⑮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Taking Stock: The Constructivist Research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2001), pp. 319-436.

註^⑯ Fred Chernoff, *Theory and Meta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cepts and Contending Accoun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 181-197.

究亦復如此，但也產生方法論無政府主義 (methodological anarchy) 的疑慮。^⑩更進一步思考，這樣就能代表著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內部的綜合嗎？還是因為國際關係學者所進行的許多不同研究，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是最好的。^⑪

就在國際關係理論還在探索 Wendt 以其科學實存論為其建構主義的知識論立場時，Wendt 又引量子力學為科學實存論辯護，這樣的觀點更將會引發爭論，又怎樣為其所言提供一把理論綜合的傘呢？其實個人反而要嘗試從神經科學或認知神經學著手，運用鏡像神經元 (mirror neuron) 的理論探索建構主義所強調的社會互動學習過程，鏡像神經元理論認為人類的感同身受或相互理解，是因為腦中的神經元網絡有一部分是鏡像神經元組儲存了特定行為模式的編碼，使人類能直接執行某些行為，甚至在看到他人進行相同行為時，就能直接心領神會、感同身受，進而產生溝通、學習與模仿的效果，以及相互理解。^⑫因為相較於量子力學，神經科學是較為接近於研究人類意識的學科，也較易為接受社會科學訓練的國際關係學者所理解與接受。更重要的是，神經科學經由核磁共振動態造影的技術已經對於心物二元論提出挑戰，所謂笛卡兒的焦慮已經變成笛卡兒的錯誤。^⑬

換言之，Wendt 所要處理的心物問題，對於科學哲學或心智哲學研究而言，這樣的爭論並非新議題，早已經嘗試運用現代科技與物理理論尋求解決途徑了。但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這樣的議題卻是非常奇特。就如同「英國國際研究學會」(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在 2007 年 10 月舉行的一場研討會主題所揭示的——「國際關係在後實證主義之後——仍是一門社會科學嗎？」(IR After Postpositivism—Still a Social Science?)，相同地，「國際關係在量子力學之後——仍是一門社會科學嗎？」。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引用科學哲學或其他學科理論追求理論綜合或是建橋計劃，都不應該脫離了社會科學理論實踐或運用的目的，使得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成為形而上學。

* * *

(收件：97 年 10 月 31 日，接受：98 年 4 月 17 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註^⑩ Daniel Little, "Beyond Positivism: Toward a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http://www-personal.umd.umich.edu/~delittle/BEYPOSIT.PDF>> (Accessed at March 20, 2008); Martyn Hammersley,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Today: Diversity or Anarch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 24, No. 1 (2004), pp. 119~126.

註^⑪ Fred Chernoff, *Theory and Meta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84.

註^⑫ Giacomo Rizzolatti, Leonardo Fogassi, and Vittorio Gallese, 潘震澤譯，「感同身受：鏡像神經元」，*科學人*，第 58 期 (2006 年 12 月)，頁 50~75。

註^⑬ 有關本人對 Wendt 量子社會科學理論的分析與評論，參閱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心物二元論——Alexander Wendt 量子社會科學理論的分析與批判」，*問題與研究*，(安排出版中)。

The Epistem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Methodological Plurals in Constructivism

Ta-hua Mo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ifferent epistemological assumptions or anxieties among constructivists, particularly, the epistemological debate between modernistic constructivists and postmodernistic constructivists, and it may not only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bridge building project within constructivism but also on the bridge building project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RT). Clearly and namely, can it be possible for the synthesis of IRT?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 more sophisticated and detailed research on constructivism's epistemological assumptions to demonstrate the complexities and diversities in IRT.

This paper takes some leading constructivists - Alexander Wendt, Jeffrey T. Checkel, Emanuel Adler, and David Campbell - as examples to study the epistemological debates within constructivism. Wendt and Checkel both are modernistic constructivists, Campbell is a postmodernistic constructivist, and Adler is in the middle. I will use their different epistemological assumptions as an observation and evaluation to check the synthesis of IRT.

Keywords: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Constructivism; Scientific Realism; Positivism; Postpositivism

參考文獻

一、中文

- 尙衡譯，*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台北：桂冠圖書，1998年）。
- 高宣揚，*後現代論*（台北：五南，1999年）。
- 莫大華，「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第38卷第9期（1999年9月），頁93~109。
- 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原型、分類與爭論—以 Onuf、Kratochwil 和 Wendt 的觀點為分析」，*問題與研究*，第41卷第5期（2002年5月），頁111~148。
- 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內部的建橋計劃—知識論的對話與綜合」，*復興崗學報*，第87期（2006年9月），頁221~250。
- 莫大華，「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橋計劃—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綜合」，*政治科學論叢*，第31期（2007年3月），頁175~216。
- 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心物二元論—Alexander Wendt 量子社會科學理論的分析與批判」，*問題與研究*，（安排出版中）。
- 莊錦農、魏中平，「解釋與批評：論批判實存論的科學解釋觀」，*政治科學論叢*，第9期（1998年6月），頁121~144。
- 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圖書，1992年）。
- Giacomo Rizzolatti, Leonardo Fogassi, and Vittorio Gallese, 潘震澤譯，「感同身受：鏡像神經元」，*科學人*，第58期（2006年12月），頁50~75。

二、英文

- Abdelal, Rawi, Yoshiko M. Herrera,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se McDermott, "Identity as a Variabl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4, No. 4 (Dec. 2006), pp. 695~711.
- Adler, Emanuel, "Seizing the Middle Ground: 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3 (1997), pp. 319~363.
- Adler, Emanuel,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p. 95~118.
- Adler, Emanuel, *Communitar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pistemic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5).
- Axelrod, Robert, *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 Agent-based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Bennett, Andrew, "Case Study Methods: Design, Us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Detlef F. Sprinz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 eds., *Models, Numbers and Cases: 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pp. 19~55.
- Binder, Martin, "The Limits of 'Humanitarian' Norms: Exploring the Selectivity of

-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fter the Cold Wa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San Francisco, CA, March 26-29, 2008.
- Brand, Alexander, “Contested Media Power-Media in North-South Relations Through the Prism of Discursive Constructiv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7th Annu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vention “The North-South Divid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n Diego, CA, March 22-25, 2006.
- Brecher, Michael and Frank P. Harvey, eds., *Evaluating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n Arbor,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 Brglez, Milan, “Reconsidering Wendt’s Meta-Theory: Blending Scientific Realism with Social Constructiv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4, No. 4 (2001), pp. 339~362.
- Buzan, Barry and Ole Waever, “Slippery? Contradictory? Sociologically Untenable? The Copenhagen School Repl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3, No. 2 (1997), pp. 244~245.
- Buzan, Barry, “Series editor’s Preface,”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ndt and his Cr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xv~xvi.
- Campbell, David, *Politics without Principles Sovereignty, Ethics, and the Narratives of the Gulf War*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3).
- Campbell, David,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 Campbell, David, *National Deconstruction: Violence, Identity, and Justice in Bos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 Campbell, David, “Poststructuralism,” in Tim Dunne, Milja Kurki,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03~228.
- Checkel, Jeffrey T.,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Politics: Bridging the Rationalist-Constructivist Divid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4 (1997), pp. 473~495.
- Checkel, Jeffrey T., “From Meta-to Substantive Theory?: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Study of Europe,”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 2, No. 2 (2001), pp. 219~226.
- Checkel, Jeffrey T., “Why Comply? 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3 (2001), pp. 553~558.
- Checkel, Jeffrey T., “Constructivism and Integration Theory: Crash Landing or Safe Arrival?,”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 2, No. 2 (2001), pp. 240~249.
- Checkel, Jeffrey T., “Social Constructivisms in Global and European Politics,” *ARENA Working Papers*, WP 15/03, 2003.

- Checkel, Jeffrey 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Fall 2005), pp. 801~826.
- Checkel, Jeffrey T., "It's the Process Stupid! Process Tracing in the Study of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RENA Working Paper*, WP05/26, 2005.
- Checkel, Jeffrey T.,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ARENA Working Paper*, WP06/06, 2006.
- Checkel, Jeffrey T., "Tracing Causal Mechan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8, No. 2 (2006), pp. 362~370.
- Checkel, Jeffrey T., "Constructivism and EU Politics," in Knud Erik Jorgenson, Mark Pollack, and Ben Rosamond, eds., *Handbook of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London: Sage, 2007), pp. 57~76.
- Chernoff, Fred, "Scientific Realism as a Meta-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 2 (June 002), pp. 189~207.
- Chernoff, Fred, *Theory and Meta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cepts and Contending Accoun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Cioffi-Revilla, Claudio A., "Fuzzy Sets and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5, No. 1 (Feb. 1981), pp. 129~159.
- Cortell, Andrew P. and James W. Davis Jr., "Understanding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orm: A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 No. 1 (2000), pp. 65~87.
- Diez, Thomas, "Europe as a Discursive Battleground: Discourse Analysi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Studi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6, No. 1 (2001), pp. 5~38.
- Doty, Roxanne Lynn, "Foreign Policy as Social Construction: A Post-Positivist Analysis of U. S. Counterinsurgency Policy in the Philippin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3 (1993), pp. 297~320.
- Editor, "Forum on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1 (2000), pp. 123~180.
- Editors of *Millennium Journal*,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the Forum on Scientific Realism and Critical Realism in IR,"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No. 2 (2007), pp. 379~398.
- Fearon, James and Alexander Wendt, "Rationalism v. Constructivism: A Skeptical View,"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p. 52~72, 210.
- Feyerabend, Paul K., *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London: Verso Books, 1978/1990).
- Feyerabend, Paul K.,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1990).
- Fierke, K. M., "Links Across the Abyss: Language and Logic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 3 (2002), pp. 331~354.
- Finnemore, Martha and Kathryn Sikkink, "Taking Stock: The Constructivist Research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2001), pp. 319~436.
- Finnemore, Martha,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 George, Alexander L.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MIT Press, 2005).
- George, Jim, *D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 A Critical (Re)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4).
- Gerring, John, "Comparability: A Key Issue in Research Design," *Political Methodology Committee on Concepts and Method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4 (2005), p. 11.
- Guzzini, Stefano, "A R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2 (2000), pp. 147~182.
- Guzzini, Stefano and Anna Leander, "Wendt's Constructivism: a Relentless Quest for synthesis,"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ndt and his Cr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73~92.
- Häge, Frank M., "Constructivism, Fuzzy Sets and (Very) Small-N: Revisiting the Conditions for Communicative Action," *Compass Working Papers*, WP2005-33, 2005.
- Hammersley, Martyn,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Today: Diversity or Anarch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 24, No. 1 (2004), pp. 119~126.
- Hansen, Lene, *Security as Practic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 War* (London: Routledge, 2006).
- Hoffmann, Matthew J., *Ozone Depletion and Climate Change: Constructing a Global Respons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 Jackson, Patrick Thaddeus, "Foregrounding Ontology: Dualism, Monism, and IR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4, No. 1 (2008), pp. 129~153.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Conclusions and Extensions: Toward Mid-Range Theorizing and Beyond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2005), pp. 1013~1044.
- Katzenstein, Peter J., Robert Keohane & Stephen Kras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2 (1998), pp. 645~685.
- Keeley, James F., "To the Pacific? Alexander Wendt as Explorer," *Millennium*, Vol. 35, No. 2 (2007), pp. 417~430.
- Klee, Robert,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Cutting Nature at Its Sea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Klotz, Audie and Cecelia Lynch, "Translating Terminolog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8, No. 2 (2006), pp. 356~357.

Klotz, Audie and Cecelia Lynch,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in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M. E. Sharpe, 2007).

Kratochwil, Friedrich, "Constructing a New Orthodoxy? Wendt's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Millennium*, Vol. 29, No. 1 (2000), pp. 73~101.

Kratochwil, Friedrich, "Constructing a New Orthodoxy? Wendt's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21~47.

Kubalkova, Vendulka,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New York: M. E. Sharpe, 1998).

Larsen, Henrik, *Foreign Polic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French, Britain, and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1997).

Lechner, Silviya, "Missing Epistemology: The 'Social' and the 'Theoretical' in Wendt's Social Theor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4th CEEISA in Tartu, Estonia, 25-27 June, 2006.

Little, Daniel, "Beyond Positivism: Toward a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http://www-personal.umd.umich.edu/~delittle/BEYPOSIT.PDF>>. (Accessed at March 20, 2008).

Lupovici, Amir, "Methodologizing Constructivism: Modifying Methods and Criteria,"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hicago IL, February 28-March 3, 2007.

Lustick, Ian S., "Agent-based Modeling of Collective Identity: Testing Constructivist Theory," *Journal of Artifici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imulation*, Vol. 3, No. 1 (2000), <<http://jasss.soc.surrey.ac.uk/3/1/1.html>> (Accessed at July 30, 2008).

McSweeney, Bill, "Identity and Security: Buzan and the Copenhagen Schoo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2, No. 1 (1996), pp. 81~93.

McSweeney, Bill, "Durkheim and the Copenhagen School: A Response to Buzan and Wav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1 (1998), pp. 138~140.

Milliken, Jennifer, "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que of Research and Method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2 (1999), pp. 225~254.

Moravcsik, Andrew, "Bring Constructivist Integration Theory Out of the Clouds: Has it Landed Yet?"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 2, No. 2 (2001), pp. 226~240.

Niiniluoto, Ilkka, *Critical Scientific Re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tomaki, Heikki and Colin Wight, "After Postpositivism? The Promises of Crit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No. 2 (2000), pp. 213~237.

- Patomaki, Heikki, *Af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ritical Real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Patomaki, Heikki, "After Critical Realism? The Relevance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http://www.helsinki.fi/oik/globalgovernance/Mallisivusto/tutkimus/After_Critical_Realism_HP23_%5B1%5D.pdf> (Accessed at July 4, 2008).
- Pennings, Paul, "Beyond Dichotomous Explanations: Explaining Constitutional Control of the Executive with Fuzzy-Se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2, No. 4 (2003), pp. 541~567.
- Pouliot, Vincent, "'Subjectivism': Toward a Constructivist Methodolog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2 (2007), pp. 359~384.
- Ragin, Charles C., *Fuzzy-Set Social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Rittberger, Berthold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 "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Explaining the Parliamentar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Paper prepared for EUSA Ninth Bienni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ustin, 31 March – 2 April, 2005.
- Rivas, Jorge, "Realism is not a Via Media between Positivism and Interpretiv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29 March, 2008.
- Rousseau, David and A. Maurit van deer Veen, "The Emergence of a Shared Identity: An Agent-based Computer Simulation of Idea Diffus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9, No. 5 (2005), pp. 686~712.
- Sanjian, Gregory S., "Fuzzy-Sets Theory and U.S. Arms Transfers: Modeling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2, No. 3 (1988), pp. 1018~1046.
- Saunders-Newton, Desmond, "When Worlds Collide: Reflections on the Credible Uses of Agent-based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Studies," in Neil E. Harrison, ed., *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 New Paradigm* (New York: SUNY Press, 2006), pp. 229~250.
- Schouten, P., "Theory Talk #3: Alexander Wendt on UFO's, Black Swans and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ory Talk*, <<http://www.theory-talks.org/2008/04/theory-talk-3.html>> (25-04-2008) (Accessed at August 8, 2008).
- Smith, Steve, "Positivism and Beyond,"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1~44.
- Smith, Steve, "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83~188.

- Smithson, Michael and Jay Verkuilen, *Fuzzy Set Theory: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6).
- Solomon Asch Center, "Agent-based Modeling," <<http://psych.upenn.edu/sacsec/research/agent.htm>> (Accessed at September 12, 2008).
- Sprinz, Detlef F. and Yael Wolinsky-Nahmias, eds., *Models, Numbers and Cases: 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 Wendt, Alexander,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3~394.
-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Wendt, Alexander, "On the Via Media: A Response to the Cr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1 (2000), pp. 165~166.
-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 An Auto-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ndt and his Cr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181~219.
- Wendt, Alexander and Raymond Duvall, "Sovereignty and the UFO," *Political Theory*, Vol. 36, No. 4 (2008), pp. 607~633.
- Wennersten, Peter, "The Politics of Inclusion: The Case of the Baltic Stat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4, No. 3 (1999), pp. 272~296.
- Wiener, Antje,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uzzles and Promises," *Constitutionalism Webpaper*, Con WEB No. 5, 2006.
- Wight, Colin,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as Ont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Wikipedia, "Agent-based Model," http://en.wikipedia.org/wiki/Agent_based_model (accessed at March 5, 2009).
- Zurn, Michael and Jeffrey T. Checkel, "Getting Socialized to Build Bridges: Constructivism and Rationalism, Europe and the Nation-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Fall 2005), pp. 1045~1079.